

楚脉  
鉴今

14

楚现  
器澜

## 编前语

战国楚简,是时光深处的文明密码,是竹片上的思想史诗。

从江陵望山到王家嘴、秦家嘴,荆州出土的数万枚楚简,如沉睡千年的智者,以沉默的笔迹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叙事。它们不仅修正了“春秋五霸”的既定认知,更让失传两千年的《孔子曰》重见天光,展现了儒家思想在楚地的独特传承。楚简《诗经》与《老子》的异文,揭示了先秦文化的多元面貌,而诗乐交融的记载,则让我们触摸到楚国礼乐文明的鲜活脉动。

这些竹简,不仅是考古的奇迹,更是思想的革命——它们证明,华夏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叙事,而是南北交融、百家争鸣的壮阔长卷。在楚简的字里行间,不仅找到了历史的真相,更遇见了文明最初的开放与包容。

## 战国楚简: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珍贵典籍

□ 张卫平

竹简,堪称“中国最早的信史”。战国楚简,是从时间的深渊中打捞出的文明遗囍,以其沉默而雄辩的力量,不断刷新我们对中国思想史起源的认知。

从考古学视角看,自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207枚楚简起,至近年王家嘴楚墓出土3200枚、秦家嘴楚墓出土3910枚楚简,荆州地区出土的楚简数量持续攀升,已达数万枚,占全国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这一系列考古发现,不仅为楚文化研究带来革命性突破,也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宝库。

## 显影历史

## 被修订的叙事与被正名的霸权

“从孔子到韩非,先秦诸子的争鸣,奏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。”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言,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时代。“百家争鸣”,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,构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框架,并深远影响着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、伦理与哲学体系。可以说,楚国的科学、哲学与文学艺术,共同构筑了上古时期精神文明的高峰。以老子、庄子为代表的楚哲学,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;以屈原诗歌、庄子散文为代表的楚文学,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。

然而,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中国传世文献主要源自齐、鲁地区。荆州战国楚简的出土,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。正如山东大学教授侯乃峰指出:“目前几乎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,都将目光聚焦于荆州出土的楚简。”当历史学者首次在荆州接触楚简时,首先关注的便是简文的版本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差异。

思想的传承,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,而更像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显影过程。政治需求与学派之争,犹如一只无形的大手,对历史底片进行筛

选、裁剪甚至篡改。秦朝的“焚书坑儒”,使先秦典籍遭受重创,中华文明几近断层。而战国楚简,作为秦始皇焚书前埋入地下的遗存,是未经后世修改的“原始底片”。荆州王家嘴出土的《诗经》与《孔子曰》、秦家嘴出土的《吕刑》与《四王五霸》、枣林铺出土的《上贤》等文献,包含大量未见于传世典籍的内容,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。滕过焚书之劫的楚简,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加真实的春秋战国。南开大学教授平山明确指出:“楚简的出土,解决了一些长达两千多年的学术争议。”

就古文字学者看来,最具冲击力的发现是关于“春秋五霸”的定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构建的“五霸”序列,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,早已成为常识。然而,楚简《四王五霸》中所载的楚王,并非一鸣惊人的楚庄王,而是“始都郢”的楚文王。一字之差,重若千钧。楚简,不仅是竹与墨的凝结,更是失落的文明在竹片上的“复活”。其以无可辩驳的原始性,重新绘制了中国思想史的基因图谱,不仅为楚文王正名,更重塑了我们对春秋战国政治思想格局的认知,将一个更加多元、更具张力的“天下”观念重新呈现。

## 儒门别传

## 《孔子曰》与失落的“楚国版《论语》”

如果说《四王五霸》修正了政治史观,楚简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冲击则更具颠覆性。其中,王家嘴楚墓出土的《孔子曰》堪称思想史上的“石破天惊”。部分内容可与今本《论语》对读,印证经典的流传脉络;同时,亦有不少未见于《论语》的语录,章节之间亦存在异文。

专家认为,楚简《孔子曰》是一部未被后世传读的《论语》,是一个被时光淹没的孔子言论宝库,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。美国汉学家顾史考评价:“王家嘴《孔子曰》的发现价值难以估量,使失传两千多年的孔子语录重见天日。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,荆州出土的战国楚简,是改变中国思想史的珍贵典籍。

战国时期,孔子思想如泉涌流,在不同地域、不同学派的门人弟子中,以多种抄本和编纂形式传播。楚地儒者所传习的,或许正是这样一部带有楚地特色的《论语》选编。这些佚文,能展现出更鲜活的孔子形象,或涉及今本《论语》未深入讨论的议题,为我们理解孔子思想的全貌打开了新的窗口。山东大学教授侯乃峰指出:“王家嘴《孔子曰》与安大简《仲尼曰》性质相似,均属《论语》成书前的流传材料,对研究《论语》的形成与儒家思想传播具有重要意义。”

## 诗乐重光

## 华夏文明的另一种可能

楚简对中国思想史的改写,也体现在对《诗》与《乐》等经典的呈现上。早在孔子之前,“诗”已是贵族教育与外交辞令的基石,但《诗经》的成书与早期流传始终迷雾重重。

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简《诗经》,主要涵盖今本《毛诗·国风》内容,但在结构、篇序及文字方面均存在着一定差异。考古研究表明,楚简《诗经》版本接近公元前450年左右。专家认为,这将“对《诗经》学史产生颠覆性影响”,是现有具有明确考古来源的诗经楚简,其价值与“安大简”相当,足以改写《诗经》学的历史。

这些差异,并非抄写时的讹误,而是暗示着先秦时期可能存在多种《诗经》编纂与传授系统。楚人所习的《诗经》,或与孔子订定的“三百篇”版本不同。楚简如同“时间胶囊”,保存了《诗经》定型前的原始面貌,为了解先秦思想的多元性、交融性及典籍传播史提供了关键的“拼图”。对此,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建委强调:“战国楚简所出土的古书,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古书的原始面貌。”

楚简所呈现的“诗”乐传统,也为理解屈原文学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语境。屈原《楚辞》中丰富的神话意象,以往多被归因于楚地独特的巫文化背景。然而,楚简《诗经》表明,楚人同样系统接受并重构了中原的诗教体系。屈原的“发愤以抒情”,并非无源之水,很可能建立在楚地特有的“诗”学

传承基础上。楚简中“诗”“乐”的融合形态,进一步揭示了屈原“歌乐舞一体”的文体特征,正是楚国礼乐文明浸润的结果。同时,也表明华夏文明早期并非铁板一块,在中原文化的主流框架下,还存在地域性差异。楚简为我们保存了这种“差异性”的珍贵样本,展现出文明演进的另一路径。从《诗经》到《楚辞》,楚简串联起的是一条南北文化交融、诗教精神地域化的线索。

关于“乐”的文献同样重要。孔子曾痛心于“礼崩乐坏”,但“乐”的具体形态,因抽象难解而后世莫详。楚简中关于“乐”的论述,不仅涉及思想层面(如乐教与政教关系),还可能包含具体仪轨记载。楚简的出土,将那个只存于文字、被视为治国要义的“乐”,重新拉回现实,令人想象其曾有的宏大体系与感召力。在楚文化中,“乐”不仅关乎礼制,更与楚辞中所见的祭祀仪式、天人沟通密切相关,是理解楚国精神世界不可忽视的维度。诗乐结合,是楚国君子人格养成的核心。楚简使这片思想“拼图”更为完整,让我们更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。

战国楚简,是一部我们远未读完的书。每一枚楚简的解读,都可能引发对既有定论的重新审视。在这些竹简的字里行间,我们找寻的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初源记忆,更是一种开放的、充满可能性的精神姿态。



荆门包山竹简。



郭店楚简,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,是截至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。可辨识的共13000余字,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,包括先秦儒、道两家的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佚书。

郭店楚简笔势圆融,流媚自然,潇洒空灵。用笔圆美清劲,秀润而挺拔纵横之气溢于简外,在楚系墨迹中也是精品。

